

罗伟章《声音史》：

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

□雷 达

罗伟章的《声音史》在写别一种更为深隐的乡村心灵史，在写乡村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写乡土灵魂的变迁，但他的方法却是超现实的或高于现实的。我看他的长篇《饥饿百年》，他笔下的何家坡的百年史就有很大的概括力，显示了他早已酝酿的雄心，那部小说除了后半部略弱，整体上是很精湛的。这部8万字的《声音史》，同样是写大地的苦难和苦难的人们为尊严的苦斗，写冷漠背后的人性的温暖。所以，我们看《声音史》不宜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它写了城市化压迫下的空壳化的乡村如何凋蔽。它的立意其实要深广得多。

当然，我们更惊异于这部小说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隐喻的、象征的世界。以声音作为材料，这是极罕见的。声音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对自然万物的浓缩和模拟，犹如丰富缭乱的曲线，声音的乡村比之物质化的乡村也许更抽象，

然而也更深刻和广涵。且看，房屋倒塌后，瓦块混杂，杨浪却能从收拾残瓦碰出的碎响，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主人们生活过的气息，已浸入瓦们的骨骼。杨浪认识声音，声音也认识他，他往这里一站，所有飘逝在旧时光里的声音，都如百川归海，朝他汇聚，并在他心里暖过来，活过来了。他会学千雷撕裂天空的声音，也会学湿雷击碎云彩的声音，还有果子掉落和芝麻炸籽的声音；以及各种家畜的叫，藏在土里从没见过样子的虫虫的叫，山里的17种鸟叫；他会学风走竹梢和树梢时发出的不同音响，会学千河口男女老少说话、叹气、哭泣、大笑和怒吼的声音。在杨浪听来，每种声音于他都是独特的，每种声音在他那里都是有质地、有颜色、有气味，也有尺寸和形状的，对他而言，一个的声音就是一个人的指纹。每一道声音的门都朝他敞开，他能够自由来去，随意进出。由此，从声音传递出极为独特的乡

土的灵魂的消息。

杨浪视角的独异性和深邃性是很让我们惊讶的。杨浪是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人，被人视为废物，蔑称为“那东西”。这就耐人寻味，似乎一些深刻的乡土作品，主角往往由“傻子”、侏儒、精神偏执者、变态者，甚至狂人来扮演，这究竟为什么？是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视角和异秉吗？也许真的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能把陌生化进行到底。

作为千河口的乡村记忆的储存者和收纳者，杨浪固然懒惰，但他有别人不理解的仁恕、宽厚。他不怨恨出卖他的钱云，不恨专制的、让他大半生倒尽了霉的房校长，不憎恨对他极为冷酷的他的大款亲哥，他负疚于李老师受他牵连而被除名。他后来腿又坏了。他说他沾不得女人。他宽待一切人，例如，夏青放下筷子，脸色变了，声音也变了，求他说：“你帮我……帮我……学学志刚说话……我只求

你学这一回，随便学几句，我听听就好，听了这一回，我就把他丢了……”

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乡村声音的意味深长。如房校长这个人专制、霸气，他的口头禅是“那样的话，羊就要吃人了。”凡是不按他的意志办的人，他都这么说。他不仅是一个小学校长，还是一种文化势力的代表。一般作者写这种乡霸，总是通过一些恶的情节，罗伟章却只是通过杨浪学他的声音，引发了一场恶战。一些声音消失了，一些声音又起来了，这是多么绝妙的写法。

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这部卓特之作也有不足。在不少情景下，声音没有起到化人情节，因之而起，因之而没，因之再起的完全与人物命运融合为一的妙用。多处只是对他的声音感的外部的生动渲染，还没有设计出更高妙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近年中篇小说中的罕见的佳作。

刚听到这部小说的题目时好奇心动了一下：声音包罗万象，罗伟章是要为哪种声音写史呢？读完小说明白了，他是为社会历史的变迁找到了一个极其独特的载体——声音。如前所述，声音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丝竹声风雨声，乐音噪音，说话声歌唱声，鸡鸣犬吠，等等等等。要用声音承载社会历史的变迁，就要找到合适的入口。罗伟章找到了杨浪。杨浪是个农民。如果说农民也能分成钻石和尘土，杨浪就是最不起眼的尘土。但这粒尘土有一项特异功能，他的“整个身体就是一部录音机，能把声音和声音里的情感保留下来”，“把消散的声音聚拢，让死亡的声音复活”，“在声音缺失的地方去回忆声音，在声音存在的地方去化入声音”。而杨浪对声音的复制有极强的选择性，在他心目中，“任何有关村落的记忆的声音就是好声音”。由此杨浪对声音的记忆就转化成了对村庄的记忆，声音史演变成了村庄史。

小说《声音史》从杨浪的童年开始写了千河口村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千河口村虽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但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有200多人，经过50多年的变迁，村里只剩下了五口人，其中有三个光棍，杨浪是其中之一。在小说中，杨浪对声音的复制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学房校长说话，引发了三个老师的争斗，造成了自己被开除。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也是作者最为强调的细节，就是李兵老师在打架过程中始终不用拿过肉、蘸上了油的右手。贫困生活对人的压抑、压榨一下子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以此为底基，罗伟章对村庄消亡过程的处理就有了一种哀而不伤的基本调。人们之所以离开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扔了，是因为离开使他们过上了越来越富足的生活。无论是先离开的杨峰、李奎，还是后离开的房校长、李老师。他们不管回不来看看，都不会再回到村庄生活。

无影无形
口牛玉秋
无声有情

小说因此流淌着淡淡的哀伤。这是面对生命流逝的哀伤，50多年，不仅杨浪他们流逝了青少年的光阴，村庄也一步步走向消亡。世间众生，都以声音宣示自己活着。死亡不是呼吸的停止，而是声音的寂灭。杨浪后两次对声音的复制就是因为有了历史的意义，他对李老师绘声绘色朗读和讲解课文的声音的模仿、对两个“跑跑女”的模仿、对建筑老爹与石娃子的模仿、对鲁细珍踢毽子的模仿，是上进，是温情，是生命力的勃发，是游戏中的享受，是贫困生活中最难得最珍贵的真善美。而那些鸡鸣牛哞声、猪撞圈栏声、羊唤乳羔声、猫扑老鼠声，以及雨声、风声、鸟叫声，每一种声音都是单个的生命、完整的生命。村庄在声音里复苏了。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画面中为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消亡献上了一首充满诗意的挽歌。

罗伟章中篇小说《声音史》——

声音消失，就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消失。天赋异禀的杨浪，纵然对声音有着极端的敏感和出色的模仿能力，如今也仅能用自己的绝技回味那些逝去的鲜活。乡村空壳化的现实，被杨浪鲜活得近乎繁复的感触和作家温润绵密的叙事，映衬出一种地老天荒的枯寂苍凉。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曾获中篇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

中篇小说《声音史》获得第十二届十月文学奖。

《声音史》的“器”与“道”

——从“言象意”说开

□赵 依

本世纪初的中国小说家中，有相当一部分致力于底层叙事与苦难书写，力图呈现所经历的时代影像和抽象历史。撇开文学命名问题，四川作家罗伟章自2004年始，以个人成长的专属区域为沃土，滋养出小人物、边缘者的人生悲欢和命运选择，多重生命线与可能性的交织在小说中由点及线，再以线成面，最终溢出其本来的视域，辐射更为驳杂的城市与社会，因而迅速以此类题材的写作向文学界昭告了自己小说家的名与实。今年《十月》第1期推出的中篇小说《声音史》则表明，罗伟章在自己以十余年笔力搭建的写作基石上又添玄妙之笔，其玄妙或可以王弼解《易》的三个层面来诠释：言——象——意。

“声音”三重奏

正如罗伟章对此篇小说的命名，“声音”在文本中的重要地位昭然若揭：从回溯开始，小说主人公杨浪将一己的童年和成长、追求与幻灭，以及相关的所有生命光影和家乡全部色泽的荣枯——以声音的形式记取。在明净的声音世界里，杨浪听见万物的周而复始，也觉察那些逝去的鲜活：学校倾圮，人去屋空，土地荒芜……小说开篇的亮点正是人物形象的设定，杨浪天赋异禀，对声音有着超自然的敏感和绝对的模仿能力，并凭此孜孜不倦地提供着叙事的策略。事实上，“声音”在《声音史》中拥有了三张面孔：一是杨浪所能洞悉的一切声音本身；二是声音本身同时作为讲述故事的“声音”(voice)，“变声”为叙事学话语层面的概念；三是作者罗伟章的声音，这也是杨浪真正想要发声却又始终失声的部分。这种“声音”

三重奏的形式就好比“言象意”说中“意生象”、“象生言”，“意”藉“言”、“象”彰显自身，而“得意”则须经由“言”、“象”。小说中，“声音”的前两张面孔既出任“言”，也表演“象”。在作者对事态现象与人物心理历程展开丝丝入扣的铺排之下，杨浪仿佛身不由己，一瘸一拐，转过院落，又走过山林，耳边翻腾的都是那些永远无法忘怀的浅吟低唱，声波振动出“普光”土地上细若游丝的斗转星移，每道波动都辉映着现代化征途中轰轰烈烈的喧闹，每个阅读者眼前都浮现出来一幅张力无穷的现实图景，而这“言”的描摹刻画，一如其对“象”的全方位呈现，都使我们欣喜于作者日益精进的语言审美和写作能力。作者在熟知并衷情的乡土世界里辛勤耕耘着，书写时空的细微与宏大，文本的每一寸土壤都填塞着个体生命的真实，丰盈其中的是人性的光影交织，小说因而得以在其朴实的基调上渲染出一种磅礴大气，最终指向“声音”看不见的第三张面孔——变迁。无论指个体的成长，还是指时代环境的改变，对于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变迁都是一个悄无声息又震天动地、一经觉察便或惧或喜，意欲言说又无可解释的复杂过程。

《声音史》试图作为这一阶段的样本和载

体，在特定的文学地理空间上陈列出与其现实某节点同步的裂变，叙事节奏舒缓，字里行间弥散着切肤之痛。一次洪水退却，村子冷清寂静，宛如遗址，昔日生机勃勃的乡土上终于仅剩杨浪和夏青两个老人还在执拗地坚守，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悠远回味以一片沉寂中的孤影照耀作为最后的抵抗……这场变迁最终走向了无声，“大音”本“希声”，这或许就是杨浪面临时代巨变难以发声的原因，现实的宏阔既归入一隅的模仿再现，更难凭少数者的自我放逐而稍作拖延。

游走在“言象意”之间

优秀的写作者往往都拥有洞悉世界、揣摩人生、思考活着的专属视域和独特方法，这也是罗伟章笔耕不辍的重要向度。《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声音史》以形而听觉写形上之时空意识，这种象征手法成为作者于该向度上“在场”的最佳证据。如果说作者的世界观是小说之“道”，那么文本形态便坐实成小说之“器”，具体到《声音史》这部8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则涵盖了“言象意”三个具体的层面，其成功架构乃归因于作者罗伟章逐渐激活的叙事奇才。

叙事学话语层面的“声音”概念，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具有特定性、符号性和技术性等特征，是一种重要的形式结构。《声音史》中，作者将杨浪作为主要叙述者，同时将其形象设定为具有超凡的听力，而杨浪对故事的讲述总是围绕其关于声音的能力展开，从而声音本身被作者巧妙地幻化为叙事策略，“声音”作为一种概念的集合由此建立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它游走在“言象意”之间，交代着“乡音”式微过程中的呐喊与彷徨。

杨浪在小说中同时担当着故事人物和叙述者两大角色，“声音”作为两种角色的主要交集，为他们分别提供着巨大的便利：它一方面使主人公杨浪真实可感，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和强烈的抒情性；另一方面又使他能够随时随地凭借对声音的记取任意切换叙述时空，以此获得在文本结构上的开合自如。通常情况下，作者会有意无意地将自我的价值取向、情感体验、生命思考、艺术感悟一应投射到叙述者身上，而《声音史》的巧妙之处正在于，小说是在杨浪对逝去声音的记取中追述虚构的乡土，声音的客观性顺理成章地屏蔽了叙述者被作者文化价值取向支配的主观性，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故事场面，并且使杨浪得以进入全知视角的范围：这些故事大多不是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声音史》写得非常好，是近年来少见的写实小说力作。故事以四川山区农村生活为背景，写了一个乡村奇人杨浪的故事。他能听到并摹仿这个乡村各种各样的声音。他的一生，就是沉浸在这些声音之中。他的人生，也在这些声音里面。所以他成了这个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边缘人，一辈子受穷，被人看不起。但是，在作家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个底层人物的独有价值：在这么一个快速变化的动荡时代，他用声音完好地保留下了乡村的历史记忆，有自然的历史，有人文的历史，有民俗的历史，有文化的历史。

所有的声音都凝聚在杨浪身上，所有的悲欢离合的乡村历史，也都聚集在他的身上。在他所表达出来的声音里，我们看到了家长里短的世俗生活，看到了生活的痛苦、艰辛、挣扎，看到了欢乐、幸福、创造，看到了乡村的失落与消亡，看到乡村无人化空心化的现象，看到乡村资源被现代资本任意掠夺的现实，看到了生态破坏、社会道德沦丧的危机，也看到生活的力量。这些林林总总的声响里，有着无限丰富的社会现实内涵。

罗伟章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永远自觉地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去思考生活、评价生活、表现生活，去设立自己作品的主题。在《声音史》里，他的这个道德意识非常清醒。所以，他能以现实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像杨浪这样的弱者，真实地写出偏远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揭示出现实矛盾冲突的深刻内涵，引发我们对中国乡村危机的道德以及人性的思考。

作家的认识是独特的。他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从一个独特的发现引发并形成精巧的艺术构思。他找到了杨浪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乡间人物，把他的传奇性艺术地放大到神化的位置，成为他塑造人物的基本面，非常自如地展开人物精神的开拓，让这个令人同情的弱者形象完整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值得高度评价的是作品的构思。看得出，作家为艺术地实现作品的主题下了极大的功夫，可以用呕心沥血来说明。一个作家要在在一个以写实为主体的文学生态出新，写出自己独特的发现，塑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物形象，有多么困难。但罗伟章知难而进，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人物的个性为抓手，从杨浪身上神奇地找到了一个思想艺术的突破口。可以说，仅是这个精巧的构思，就可以奠定这部小说的基本品质。

有意思的是，小说所有的内涵，大都通过杨浪对声音的掌控得以实现，得以表达。千河口的各种传统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都经过杨浪这个奇特的本事过滤，释放出时代的信息，折射出现实生活的真实本质。

可以说，杨浪这个人物塑造尽管从传奇性入手，但随着作品娓娓动人的叙事的展开，我们会发现他身上的传奇性已经被真实而质朴的人性所替代，成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品质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差的人，但他对声音的记录本事却无人能比；他一生都在做着看上去无用的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回过头看，他的工作却特别有价值。因为我们在这里保存了历史，保存了珍贵的文化记忆。他是一个穷人，身上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什么财产，但他拥有了全部的声音，这就拥有了历史，也就拥有了精神财富，因此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作品写到了他和农妇夏青的关系，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内涵，整个人物精神品质得到了升华。虽然，夏青希望杨浪最后一次摹仿前夫的声音，但我们发现，他们在这块被时代遗弃的土地上开出了情感之花。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护人，也是我们文化的守护人。

作家由此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内在力量的弱者形象。这个人物，在当今小说人物画廊中非常特别，会有自己应该的位置。小说《声音史》也是近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发生在杨浪身上，但是杨浪通过听见“声音”获得了全知的能力，他甚至可以出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对故事做全方位的把握，同时又不显得生硬。

在这种虚实相生的叙述结构中，叙述者杨浪作为艺术创作的客体更多的成为理念的产物，与小说中的其他虚构人物分属于两个错落的本体存在层面。尽管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杨浪在人物形象丰满度和鲜活度等方面的欠缺，但罗伟章到底是通过“声音”为故乡历史虚构成做好了叙事的人称视角和叙事空间准备，“普光”或许离高密东北乡和香椿树街那样的文学地理空间还有一段距离，但它已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关于“意”

作者之“意”乃小说之“道”，好的小说常以言外之意的隽永营造意犹未尽的艺术效果，《声音史》也不例外。小说正是通过全方位的现实描写烘托出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它致力于表达宏大历史潮流中个体力量的微弱与坚守，我们从中不难体悟作者审视文化和理性，反思现代性，批判城市化，从而呼唤某种永存本真的用意。

罗伟章的用意叠加了小说的惯性，这驱使读者进行几番慎重的思考。更可怕的是，一些乡村题材书写在自我满足式的写作中，小说人物趋向理念，与现实中活生生的劳动者丝毫不亲近，所以被书写者不认同书写，他们与其接受这种被俯视的憋屈，倒不如在冲决中伤痕累累，然后走向开阔，走向兴盛，走向未来。

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力作

张陵